

寻访

大陈岛老兵

再走垦荒之路 重温燃情岁月

第三期·人物名片

袁相月,1946年出生于天台县城关镇。1966年来到大陈岛,被分配至原台州军分区守备第81团一营卫生所任卫生员。196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。1970年从部队退伍后就读于浙江医科大学,1973年毕业,先后在天台街头区卫生院、县卫生防疫站、县卫生局等单位任职。2006年10月退休。



本版老照片均由袁相月提供

袁相月：四年海岛卫生兵改写一生

本报记者彭洁 实习生蒋枫文 本报记者杨辉/摄

75岁的袁相月说,大陈岛军旅生涯改写了他的生活。

如果那年没有响应参军号召前往大陈岛,从没有接触过医学的他,是不可能披上白大褂、背着药箱,把“救死扶伤”“医者仁心”八个字在心里又化为行动的。

如果没有那几年部队卫生员的从军经历,贫困家庭出身的他,也许没有机会去浙江医科大学读书,后来也不会走进医院、机关工作。

“可能也不会有现在的好日子……”老人憨憨一笑。

不曾倒流的时光,不会给出如果带来的答案。1966年,当他穿着军装踏上大陈岛时,袁相月的人生,注定烙下“大陈岛老兵”这几个光荣的字眼。

参军

袁相月幼年时,家境并不富裕。10岁那年,父亲因意外去世后,一家人的生活更是陷入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困中。但即便常常饿着肚子去上学,16岁的袁相月还是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初中学业。

1962年,家里实在拿不出钱继续供他读书了,袁相月便到石灰厂和砖瓦厂做临时工,一天干10个小时,挣7角钱,但还常常无活可干。

后来经人介绍,袁相月辗转在两所乡村小学任教。往后几年,他参加过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工作,在街头区粮食管理所参加过夏粮入库工作,在街头区财政所当过财税员,后来又调到天柱公社工作。

1965年年末,袁相月接到一个棘手的工作:负责周边四个村子的征兵任务。可兵源不足,征兵任务迟迟完不成,他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:“我要带头去当兵!”

家人完全不能理解袁相月的决定,“别人当兵是为了以后谋出路,你都有一份正式工作了,还去当什么兵?”

“参军多光荣!穿着军装那么威风,还可以保家卫国!我就要去当兵!”袁相月的执拗劲儿上来了,“想去当兵还有个原因,我想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”

那一年,共有540名天台籍青年到大陈岛当兵。他们被充实到步兵、炮兵、有线电兵、侦察兵、警卫兵、卫生兵等队伍中。其中,5个人被分到卫生队,袁相月就是其一。

但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卫生员,多年的工作经验完全派不上用场。对于毫无医理知识的袁相月来说,一切要从零开始。

新兵首先要到团里的卫生队培训。在每天上午8点开始上课之前,袁相月和战友还有许多活儿要干。比如,负责卫生队厕所和厨房的清洁,“要求一只苍蝇也不能有,我们每天很早就起来打扫卫生”。

还有每天雷打不动的打热水。卫生队有50个病房,房里的热水壶每天都要打满热水。病房在山坡上,热水房在山脚下,几个新兵每天要来回跑上好几趟,才能干完这活儿。去程还好,回程的热水壶里灌满了滚烫的水,稍不注意,容易在奔波中因颠簸烫伤。

但没有人注意这小小的烫伤红印,毕竟跟练习注射时,大家拿着针管互相将细细的针往对方身上扎相比,这实在算不了什么。“理论知识有了,但皮下注射这些技能要练手,我们几个就你给我打针,我给你打针,扎得上臂全是小针眼……”听着就感觉疼,可陷入回忆的袁相月摆摆手,“不痛的,那时候根本不怕痛的”。

培训结束,袁相月被分配到原台州军分区守备第81团一营卫生所,正式成为一名卫生员。

卫生员

一营卫生所,设在上大陈岛的最高峰风门岭。除了袁相月,还有所长、医助和一名卫生员,4个人负责一营五个连队500多名战士的医疗门诊任务,附近的大岙里村和小半天村村民的医疗也由他们负责。

袁相月感受到了忙碌,没多久,忙碌又翻了几倍。“所长到地方参加活动,医助到台州医院进修,整个一营卫生所就剩下我和另一个年轻的卫生员。”年轻的卫生员资历尚浅,所有的医疗任务几乎落到袁相月一人身上。

当朝晖洒出东海海面,袁相月便开始一天的忙碌。他要先到连排班巡回医疗,发现病号就马上进行治疗。面对大量医疗门诊任务的袁相月斗志昂扬,看病的人一个接一个,他忙碌着,像不停旋转的陀螺,没有一



刻停歇。当大陈岛进入夜幕,枕着波涛安睡时,袁相月多半又不会“爽快”地睡去,要是遇到重病患者,他索性连觉也不睡了,把被褥铺到病人床边,通宵护理。“那时候年轻,总感觉全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,一点也没觉得累。”

偌大的海岛,实在太缺卫生员了。那时的大陈岛,约有2000多名官兵,岛上条件有限,五六千岛上居民的医疗也大多依赖部队卫生所,可卫生员总共就十来个人。

袁相月就背着医药箱到处跑,“哪里缺人我就到哪里,哪里有病人我就去哪里。”一连、八五炮连、新兵连、雷达连……那些缺少卫生员的地方,都留下了他的身影。除了医疗门诊,难得的闲暇时光,他还要去检查食堂卫生,冲洗和消杀厕所,甚至,细致到连通知食堂烧病号饭这件事,他也没忘,“我就是闲不住的个性,有事干,我觉得特别快乐”。

但作为一名卫生员,最让他感到快乐的是,是救死扶伤后的喜悦。

大陈岛是一座红色海岛,国民党从这里仓皇撤离时留下了许多炮弹,岛上居民识不得,因误动炮弹引发爆炸而受伤的事情时有发生。

1968年清明,袁相月正在山上植树。突然,山那头发出一阵剧烈的声响,一团团黑烟腾空而起,紧接着,是尖锐的呼喊声,“救命啊!有人被炮弹炸伤了!”

袁相月连忙扔下手中的工具,向山那头飞奔去。只见一个男人痛苦地倒在地上,血从他的身体里渗出来,染红了地。袁相月心头一颤,迅速蹲下,查看起男人的伤势来。

坚硬的炮弹残片穿透了男人的腹部,这是袁相月第一次在救人时感到害怕,包扎伤口的手不住地颤抖,汗珠混着血滚过他的额头。

“我当时真是又害怕又急着救人,等救护车把人拉走,我浑身都是汗,好在那人最后给救活了。”袁相月强调那辆“救护车”,“那时岛上的救护车都是用解放牌大货车充当的,虽然是大货车,但救人还是蛮及时的。”

那年9月,他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一年后,他加入一个夜晚,袁相月刚从大岙里村抢救完一名被炮弹炸伤的病人回来,就听到外面传来急促高亢的呼喊,“解放军救命!解放军救命!”

他赶忙跑出去看,一个认识的小半天村村民满脸焦虑地站在门口,怀里抱着一个婴儿,“袁医生,你快看看,孩子不行了……”袁相月凑过去看,婴儿面色发白、嘴唇发紫,一呼一吸都十分困难。他检查后发现,婴儿的喉头被浓痰和奶汁堵塞,随时都有窒息死亡的危险。

“这种情况,打吃药都没用,要救人就得把堵塞物吸出来。”袁相月立即抱过孩子,嘴对嘴地从婴儿喉咙里吸出好几口浓痰……孩子转危为安。这一事迹,后来被报道宣传——1970年7月10日出版的部队报纸《人民前线》,赞誉他具有全心全意“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”。

这篇报道,是对袁相月军旅生涯的一种褒奖。

退伍

另一种褒奖,来自大陈岛的百姓。

“在部队期间,我们与老百姓一直保持着军民同守同建大陈岛的友谊。”袁相月说,那种军民鱼水情,真得靠“鱼”维系——“那时候海里有数不清的黄鱼,打捞上来卖8分钱一斤,老百姓给部队一送,就是四五百斤。”

1970年2月,回味着大陈岛黄鱼的鲜美滋味,袁相月退伍回乡。和他同时入伍的战友丁兆佳仍在岛上。1984年7月一个晚上,已是卫生队队长的丁兆佳急着为小岙里村村民徐正相做穿孔手术,岛上却停电了,他就让其他4个医务人员各拿着一个手电筒充当手术照明灯,自己主刀,一个多小时后,手术终于成功。“前几年,我和丁兆佳等战友重登大陈岛,徐正相的儿子徐道国早早就在码头迎接我们了。”这让袁相月很感慨,“我们离开大陈岛几十年了,岛上的群众没有忘记我们,有很多人至今都还跟我保持着联系,大家就像亲戚一样”。

离开部队的袁相月,被分配到原新公社信用社工作。1970年10月,停招多年的全国大专院校开始招生,新公社分配到一个招生指标。在公社委员会的集体决定下,这个指标落到表现突出的袁相月头上。一个多月后,参加完县里举办的欢送会,袁相月来到杭州,正式成为浙江医科大学的学生。

1973年,从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后,袁相月先后在天台县街头区卫生院、县卫生局、县卫生防疫站等单位工作,“在机关、医院、农村,都留下了足迹”,直至2006年退休。

回望在卫生系统工作的30多年,袁相月是有遗憾的,“后来干得更多的是行政工作”。但在他的记忆里最深刻的身影,还是那个在接诊被蛇咬伤的病人时,划开伤口,毫不犹豫上去,用嘴将毒血一口一口吸出来的自己。

“治病救人,更有成就感。”他缓缓地说。

用相机记录时光美好

本报记者彭洁/文 杨辉/摄

袁相月很爱笑,尽管笑容会让他脸上的皱纹变得更深,但他从不吝啬爽朗的笑容。他自己笑,也喜欢用照相机拍下别人的笑脸——那些生活中的点滴美好,在他看来尤为珍贵,也值得被保留下来。

三十多年,是袁相月在卫生系统工作的时间,也是他热爱摄影并孜孜以求的时间。

袁相月清楚地记得,自己第一次拿起相机的时间:1974年。

那一年,他拿着每月40多元的工资,却对一台价值100多元的海鸥相机念念不忘。

袁相月知道这种念头因何而来,世间的苦难与美好,都那么容易消逝,他渴望用相机记录下出现在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个熟悉的人,每一件快乐的事,每一处旖旎的风光。

海鸥相机的拥有者,是一对在天台支教的上海夫妻。袁相月想着,要是能借来用用该有多好,便登门拜访,表明来意,“我愿意给你家干三天活,借相机小半天,或者两三个小时也行”。

他的诚意打动了上海夫妻,相机借到了,他爱不释手。暗房中,当拍摄的画面在药水中慢慢显现,他感觉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他想,一定要拥有一台自己的相机才行。

但在拥有一台相机之前,他已经拍出了一张令自己至今都满意的照片。那是一张自拍照,黑白相片里,一个青年侧着脸,拿着画笔,正在描绘一张周恩来总理的肖像。1976年1月8日,总理逝世。袁相月本想正式悼念,但当时没有地方出售总理画像,他便自己画了一张。没有三脚架,相机就放在旁边的桌子上,拍摄距离也完全凭他的感觉设定。相片的阴影中,袁相月的侧脸棱角分明,看不清表情,但相机拍摄的一瞬间,画面还是定格了他的悲伤。

后来,经济宽裕了些,袁相月终于有了自己的相机。从祖国的大好山河到天台的一街一景,从工作中的会议、检查到生活里的出游、跳舞,还有亲戚朋友家的婚嫁、迁居喜事,他都拍摄记录。每一次,他高高高兴兴地,热心一如大陈岛上那个“有事干就很快快乐”的袁医生。拍完照,回到家,走进卫生间充当的暗房,把门一闭,时光仿佛停了。

2000年后,袁相月开始有意识地用相机记录老人



袁相月讲述摄影故事。

的故事,特别是运动健身中的老人。

这几年,袁相月还走遍天台各个乡镇,拍摄了24位百岁老人,汇集成一本《康养天台——天台县老龄工作掠影》,并建立健康档案,对天台老人如何健康长寿作了探索。

更多的镜头,袁相月留给了家人。1975年至今,他搬了5次家,每一个家的样貌都有照片记录。袁家如今居住的房子是2002年购买的,在袁相月的照片里,这两间三层半的楼房绿意盎然,明亮又诗意。

1973年11月28日,他与妻子许美婷结婚。有相机



袁相月与妻子许美婷在大陈岛留影。

后,妻子如花的笑颜便常常出现在相片中,从黑白到彩色,他都记录在册。两个女儿从小到大的模样,更是被父亲的相机详细记录。有了外孙女、外孙后,相片也跟着他的心变得更加柔软。

将自己拍摄的照片稍作整理,袁相月出版了一本《袁相月影集》,由原天台县卫生局局长、党委书记张樟浦作序。张樟浦写道:“袁相月在摄影生涯中,每一幅图片,不仅是对美好往事的回忆,对祖国、对故乡、对家庭的眷恋,更是充满着火热的感情和无限的希望,传达出对未来的思考和信心。”

“咔嚓”声响,永恒定格。